

我国养老问题面临困境需破局

冬日暖阳映射在香山脚下,连续的寒潮天气过后,北京的气温已开始回升,这也让香山周围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。但这一切,与香山附近一家养老院的老人们似乎并无关联——他们的世界一切都是安静的。

李凤清老人的老伴拄着拐杖安详地坐在爱慕家养老院的座椅上,这位83的老人已经开始失忆,只是偶尔,他才能够想起当年南下广州造船厂的烽火往事,大多数时候,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……

两位形影相吊的老人背后是一组日益庞大的数字:截至2009年,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.67亿人,占总人口的12.5%,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1/5,成为世界上唯一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。据预测,到2035年,每两位老人,对应仅有1名孩子。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,对我国的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及社会伦理等方面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

中国的养老现状令人担忧,仅从城镇养老院严重不能满足日益老龄化的需求就可窥见。私人养老院费用昂贵,公立养老院严重不足,家庭养老问题诸多。住不起、住不进、住哪里,正成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心病。

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,在今后的一段时间,如果养老困局未能寻得中国式破解,最浪漫的事,未必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

住不起—— 民营养老院环境好,但是 价位太高

位于香山脚下可仰望整个景区的爱慕家养老院已成立两年,是北京地区规模比较大的民营养老机构,比较具有代表性。12月17日下午,记者走进了这所养老院。

置身其中,时间凝固了一般。看上去,这里更像是一个度假会所。两栋洋房式的宾馆楼窗明几净。在一个样板间里,摆放着两张席梦思床,中间是一个台柜,上面有固定电



“一床难求”

话,还有一个紧急感应器。壁挂电视、空调、卫生间,还有一个阳台。可以说,宾馆里的这里一切都有。

工作人员刘婧梅告诉记者,这样的一个房间,一个月要5000多元,还不包括吃。这里有两名大夫和一名护士专门负责老人的健康,每天都要给老人测量血压等常规身体指标。一天24小时都有专人值班,他们会紧盯着感应器。

这个养老院还有一个月一万元的房间,里面的装潢均为宫廷风格,欧式的靠椅、壁炉,高级洗浴间,一共两间卧室,两个卫生间。大阳台,独立小院子,里面设有摇椅。

李凤清老人告诉记者,自己对这里的环境和服务非常满意:“但实事求是讲,价位贵了些。”

李凤清原籍河北,在广州一所中心小学当了十几年老师,他的老伴是原六机部的高级工程师,新中国成立前就南下,属于离休,膝下四个女儿,两个在广州,一个在澳洲,一个在北京。由于夫妇两人都是北方人,还是更喜欢北京的生活和饮食,于是回来了。

李凤清说,刚开始来的时候住在女儿家里,女儿女婿对他们非常好,可是外孙女每天要弹钢琴,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弹。两个老人一则心肝受不了,二来两人也怕打扰外孙女练琴。两位老人一天就坐在房间里,常常大气不敢出,大眼对小眼。

于是他们搬到了女婿在昌平的别墅里,可是偌大的别墅里只有他们俩和一个保姆,“湊桌麻将都凑不齐,而且老伴目前逐渐失忆,需要多和人说话。”于是李凤清老人就找到了这个养老的地方。他们打算在这里住到春节,尚未最后决定住在这里。

据养老院的刘秘书介绍,这个养老院只收具有自理能力的老人。价位在北京算中上,不能说是最高的。

记者了解到,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是比较高端的人群,分别来自协和和医院、新华社以及北大等高校的离休教师。

住不进—— 公办养老院 床位紧张,根本 住不进去

与爱慕家一墙之隔,是香山老年公寓,这是一所民政局下属的公办养老院。从外观上看,环境与设施与新建的爱慕家相比具有不小的差距。当天下午,大门紧锁,里面锁着一条狂吠不止的狼狗。



12月6日,南京街头拄着拐杖蹒跚出行的老年人。

据住在爱慕家的老人介绍,他们第一时间想去的还是公办养老院,因为在这些老人的观念里,国家办的正规,而且一个月不到3000元的费用也比较少。但一咨询,根本排不上队。

“去公院得排队,床位太紧张,一排队就到后年去了。”78岁老人刘天庆告诉记者。

床位紧张是老人们提及公办养老院难以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原因,但刘天庆这位原北大教授告诉记者,公办养老院的服务质量也是个问题。他的独生子目前在美国,他也不愿去美国。因此他退休后就早早住进了养老院,最早就去了位于北京祁家豁子的一家号称样板的公办养老院。

“到里面一住发现比之前想象的差远了,我吃了他们餐厅一顿饭,拉了半个月肚子。”刘天庆愤愤地说,见个院长比登天还难,一个老人在电梯里摔倒了,办公室主任看都没看一眼就走过去了。

虽然记者无法核实到老人所说的是否有夸大的成分,但可以想象,他在那个养老院一定有不愉快的经历。

据了解,北京市现有养老服务床位不到4万张,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.8%,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为5%至7%。

解难题—— 中国式养老破局,需中国 式解决之道

刘婧梅是爱慕家养老院的一个工作人员,

出生于1987年,刚毕业半年。虽然她十分热爱养老事业,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打算未来将自己的父母接到养老院的打算。

她告诉记者,来这里的老人都具有一定的修养,但并非都能转变观念,但凡子女把父母送来的,老人普遍心情抑郁,而自己主动来的,心情才比较平静。

中国具有重视亲情与团圆的传统,在中国的价值观念里,将父母送去养老院,或者老人自己选择去养老院,起码在目前,还不能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并不具备家庭养老的条件。

“我不会送父母去养老院的,条件再好也不能让去,护理人员再好比得上家人么?”在外企工作的齐阳告诉记者。但他也知道,这样的表态相比社会的现实更像是口号式的表态。因为他即将面临两小养四老这一普遍现实。他和妻子刚刚首付8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,每个月付6000元月供后生活已经很紧张,很难把父母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赡养。而且,妻子家的两位老人也已经退休了。

“两小养四老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养老困境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,中国式的养老困境必须寻求中国式的解决之道。

一些人提出社区养老可能是比较符合中国城市养老现状的一条道路。不同于传统家庭养老和养老机构养老,“社区养老”除接受家庭照顾外,主要依托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网络和义工自愿养老服务,兼具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点,被认为是当前最为可行的选择。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说:“老人住在家中,但是

养老服务却是由社会来提供。老人既留在熟悉的环境中,又能得到生活和精神上的照顾。”

同为全国政协委员杨超也认为,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,具有

医疗服务专业化、社区规模体系化、资源配置成本低等优势,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基本养老的需求。

夕阳下,李凤清老人叫醒了在歌声中沉睡的老伴,她说原来设计枪炮的老伴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,为了避免他担心,自己经常告诉他们只花了2000元来住这里。

“我们的住宿费只有2000元,你就别操心啦。”李凤清大声在他耳边说,“咱们有房子,还花2000元住这啊。”老伴嗔骂着……

■采访手记

关心老人就是关心我们自己

采访中,心里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:社会发展真是快,快得我们都来不及看到,有些特殊群体与问题就已经出现了,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。

即将或已经到来的“银发狂潮”就是这样一个问题。我们这个狂飙猛进的社会是不是可以略微地停下脚步,审视下过快前进的过程,是不是有些东西比冰冷的数字更加重要,比如社会福利的跟进,比如收入分配的更加合理,比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,再比如大量出现的可能遭遇老无所依的老年群体。

海淀区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完全依靠政府包办养老是不现实也不科学的,需要拉开层次,依靠市场资本投入养老。诚哉斯言。只是,我们在教育、医药卫生各相关领域有过似曾相识的博采,政府包办还是完全交给市场,在当下国情下,似乎两种极端都已经印证了效果不理想。

目前,在问题暴露得比较严重的医疗教育领域,回归公益化,民办公助的改革已经达成共识,并在稳步推进中。而养老的问题却似乎刚刚开始被关注,既然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,我们应该尽快拿出问题的解决之策。让我们将脚步稍微放缓一些,认真审视下这个并非马上就出现但不久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

民营的价格高,有时过分以盈利为目的的服务会变味,而政府包办回归计划体制更是倒退,没有效率。一些专家提出社区养老,引入社会志愿者是一个办法,国家应给予扶持。

这一切措施的背后,都要有一个态度,社会发展又好又快,既要GDP,也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领域的齐头并进,有的时候,步子慢下来未必不是好事,可以让我们补齐短板,毕竟这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。

让社会的步子慢下来,关心下老人,关心他们的今天,也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。

据《工人日报》

新闻时评

“宴收”在一片抱怨声中挺进

上网浏览新闻,看到“干部抱怨年终验收似‘宴收’;写材料外陪吃喝”,一些县委书记感慨陪领导检查、汇报、喝酒(戏称“三陪”)太累的消息。(人民网12月20日)

不禁联想起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。那是在23年前,笔者针对当时对某项教育达标工作,有关部门往往是,“一赴宴”,二检查,三发“合格证”的现象,写了封《岂能“以宴代检”》的“读者来信”,于1987年2月23日被省内某报刊发。

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,笔者当年抨击的这种不良现象,不但未有丝毫减弱,反倒在一派“喊打”和抱怨声中公开挺进,甚至愈演愈烈之势。近期,记者深入广东、浙江、江西等东中西部10多个省区市场调研,与50多位县委书记倾心交谈,发现这些县委书记心里话要说。有些县委书记称自己是“三陪”书记: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、陪着汇报工作、陪着吃喝陪饭。说是他们每年参加会议、应付检查指导就占了三分之一时间,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、解决问题。可这又是身不由己,而且丝毫不敢怠慢,实在是太累。一些基层干部则抱怨说,到了年底整天为评比验收忙活,除了写材料就是陪吃喝,因为“现在的验收成‘宴收’了”,哪有时间和心思干干的正事。

在名目繁多的各种检查评比中大吃大喝,已成了一股见怪不怪的风气。领导机关有,基层更是应接不暇。据媒体报道,一些乡镇干部说,有时一天最多接待20多位上级领导机关的头头脑脑,陪吃喝陪不过来。有的穷乡,一年仅有的几十万元办公经费,大多都花在了这上面。

如此频繁的评比“宴收”,把干部搞得身心疲惫、苦不堪言,心烦却不敢言。因为有时“宴”不好,不要说有关部门给“小鞋”穿,就是“紧紧鞋带”,下级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这是其一。

其二,是因“宴请”花的都是公款,基层也不想因此“得罪”有权进行检查评比的上级官员,更何况有些部门就是“以宴代检”,基层单位及其干部哪敢拿“鸡蛋碰石头”,没事找事?

其三,更重要的是,因一些上级机关把检查验收评比,当做必不可少的作品内容或政绩来对待,下级即使内心抱怨,表面也不能和不敢不热烈欢迎不盛情宴请。至于这些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,接二连三轮番上阵的“宴收”,所造成的劳民伤财,浪费巨大,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,则很少有人考虑了。

“宴收”为何在一片抱怨和“喊打”声中一直“挺进”?对此,我们各级组织及其干部,真该好好反思。
魏俊兴

“保卫汉语”是一场虚构的战斗

不久前举行的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上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教授,对当前大学生汉语应用能力表示担忧,引起不少网友共鸣。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80.8%的人确认我们当前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。“保卫汉语势在必行。”专家认为,汉语应用能力危机的背后,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12月21日)

“保卫汉语”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。早在2004年,在“2004文化高峰论坛”上,著名作家王蒙发表题为《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》的演讲,呼吁全球华人展开一场汉语保卫战,母语已经面临危机。记得当时,“保卫汉语”旋即成为很热门的一个话题,应者甚众。

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汉语应用能力的危机?73.2%的人认为,原因在于“网络时代,人们在使用汉语时不太规范”。还有52.0%的人认为,汉语危机的原因在于“很多人重视外语学习,轻视汉语学习”。一言以蔽之,汉语之所以“危机”,在于网络时代

服务要先于惩罚

有个城市街头乱摆摊位、烧烤云集,于是发通告、搞罚款,城管与小贩你来我往,你罚我来“拉锯战”,就是禁不住。后来改变思路,放下架子,深入调查,才发现摊贩大多是“40、50”下岗人员,有的还就是靠着摆摊谋生。于是,当地政府创造条件,将这些下岗人员安排为保洁员、路口秩序协勤员或到一些服务性行业工作,在适当地域划出一些经营区,结果呢,市容整洁,秩序和谐。

这个难题的破解,蕴含着一个简单的道理:服务先于惩罚。服务是目的,是方向,惩罚不过是手段,是辅助措施。遗憾的是,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多是“不教而诛”,“罚”字当头,动不动就罚、就抓、就追、就撵,甚至对“罚没”下任务、定指标,把“罚没”作为部门超编人员工资来源、福利、不正当开支的“小金库”。即使是“服务”,也变成简单的“收费”,倡行“法治”则变成

“罚治”。其结果,必然进一步激化矛盾和问题。

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,服务是天职,是第一职能。树立服务的理念和意识,把服务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、解决问题的方法,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,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水平,乃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基本要求。“以罚代管”发展成一些部门的日常工作方法,看起来是工作方式简单粗暴、社会管理能力弱、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,实质乃是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的阙如,根源则是权力让一些职能部门和官员自我膨胀,淡漠了百姓感情,忘记了权力是谁赋予的。

管理就是服务,优质的服务才能实现良性的管理。遇到管理方面的难题,不可指责民众的“觉悟”与“水平”,不要埋怨百姓的“无知”与“无序”,不能抱怨群众是“刺儿头”难管治,而要首先检讨自己是否失职,反省自己的服务意识是否空封、服务工作是否缺位、服务渠道是否阻塞。如此,社会秩序、社会和谐不清自来。
姬建民

拆迁利益博弈要摒弃线性思维

强拆所以成为常用手段、命案所以时有发生,与一些官员的线性思维模式高度相关。正是这种线性思维,官员认为钉子户要价过高不能满足,就必须通过强拆手段拔掉这颗钉子。战争年代,敌人当道,把钉子拔掉是必需的。但面对人民内部矛盾,如果让拔钉子思维成为一种治政理念,则是要吃大亏的。

拆迁是利益博弈。官员指责拆迁户人心不足蛇吞象,拆迁户也会指责官员与民争利,一方强制伺候,一方以命相对。如此博弈当然只会博出命案来。摒弃这种线性思维,放弃拔钉子的思维方式,拆迁的道路会更宽阔。

在利益博弈面前,无论是官员还是拆迁户,都别太高举公共利益之类的大旗,坐下来谈判是最务实的办法。谈不拢,就找第三方比如法院作出公正的仲裁或判决。此外还有一个博弈的第三种方案,这会使双方都趋于理性。

钉子户确实漫天要价,或主张居住权给多少钱也不走,怎么办?在捍卫钉子户权益的前提下,设定绕开它、与钉子户共生的方案。面对这第三种方案,双方就会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重新坐下来谈判。基于人的经济理性,这第三种方案往往不会走进现实,只是双方博弈的平台。

北京海淀区林萃路上占道四年的钉子户12月17日夜终于拆了,补偿款秘而不宣。朝阳区一钉子户依然占据马路,却在期待“求求你,拆了我”。如此缺乏第三种方案的漫长博弈,最后要么钉子户胜,获得巨额补偿,却损害了补偿的公平性,客观上畸形地鼓励拆迁户都去当钉子户;要么拆迁方胜,维护了补偿的公平性,却损害了钉子户的正当权益。而无论谁胜都使交通通畅这一公共利益严重受损。

假如当初有第三种方案,比如拟在钉子户上建一座桥。钉子户面对的将是,失去改善居住环境条件的机会,要价过高必一无所获;拆迁方面面对的将是,钉子户为居住权而坚持,就必须为建桥支付巨额成本。这样博弈,结果都将最优:钉子户多了理性权衡的机会,自动放弃要价过高,合理要求得到满足,减少出现或玉石俱焚、或长期坚持一无所获,或获巨额利益等极端情况;拆迁方必须支付建桥成本,既捍卫了补偿的公平性,又维护了公共利益,也尊重了钉子户权益,更重要的是,展示了发展文明、城市宽容、法律尊严。

一些地方钉子户长期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地共存着,乃是地方政府在放弃强拆之后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,根源仍在线性思维。第三种方案,或是解开拆迁僵局中强拆死棋的一步妙手,无论是对于拆迁方、钉子户,还是地方发展、社会和谐、法治文明,都将获得效益最大化,关键看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和有诚意。
陈家兴



醉驾就得算犯罪

新华社报道,新的刑法修正案二审草案,对“危险驾驶犯罪”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,进一步加大对醉驾、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。凡醉酒驾驶机动车,不管情节是否恶劣、是否造成后果,都将按照“危险驾驶”定罪,处以拘役并处罚金;如果有醉驾、飙车行为,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,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醉酒驾车造成的公路交通事故,近年来呈快速上升趋势。
吴之如 文/画